

# 潜规则重重 职称已成中国之“累” 乡镇农技人员生存现状调查

本报记者 李明德 实习生 李青文

任职期年度考核表、学历证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民主测评汇总表、送审代表作原件……厦门市某重点中学初三语文老师刘飞(化名)最近瘦了不少,为了参评“中一职称”,他已经“奋战”了半个多月。“最麻烦的是一学年的教案,全部要手写!”刘飞现在每天抄写教案就要熬到晚上十一点多,连备课都顾不上。

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开始了。为了评职称,有人疲于奔命,有人拉关系找人情,有人憋着不评职称,却无法得到公平待遇。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互动百科进行的一项千人调查显示,54.6%的人赞成取消职称评审。

## 教师成为最受职称之“累”的职业

哪些职业最受职称评审之“累”?调查中“教师”排在首位,73.2%的人选择此项。紧随其后的是“医生”(64.6%)。接下来还有:学者(41.4%)、工程师(37.5%)、作家(34.2%)、技术人员(32.1%)、媒体从业者(26.5%)等。

“评审团到底怎么衡量我们的水平?通过论文还是看谁把教案抄得更工整?”刘飞现在只能把疑问搁在一边,老老实实准备。活生生的教案摆在眼前:有个历史老师,教课的班中考成绩每年都是第一名,可他的职称评审就没过关,因为论文不够,学校一点办法都没有。

调查中,76.5%的人意识到目前职称的最大问题是,职称评审制度不能反映人的实际能力;74.2%的人指出,职称评审造成寻租、作假、腐败现象严重;65.7%的人表示,名额分配中潜规则重重,拉关系等现象层出不穷。

职称评审甚至催生了一个“论文代理”产业:承诺可以在权威期刊上发表,甚至可以代写论文,这些都是明码标价。记者以普通客户的名义致电一家论文代理公司,负责人徐某表示,如果是普通杂志,发表费用600-1000元。但现在杂志版面都排到12月了,要着急发,只能多交钱,一篇加急费是400-500元,保证发出来。“我们是和杂志社长期合作的,省级的、国家级的都有,核心期刊也有。”

徐某强调:“肯定查不出来。我们从2003年就开始做,从来没有被查出问题。”每天都有很多老师、医生、国家机关人员找过来,他们都是需要评职称的。以中小学教师最多,大学教师主要联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

## “如果按照现在的体制,林巧稚都评不上教授职称”

对愈演愈烈的论文代理现象,一些高校已有所应对。广东省人力资源管理协会副会长、广东商学院董福荣教授告诉记者,广东不少高校都列出了自己认可的期刊名单,一般都很有公信力。还有一些杂志则上了“黑名单”,不管评什么职称,看到这些杂志就不会通过,因为肯定是花钱买来的。

“堵住花钱发论文的路子,也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董教授指出,“职称评定表面上会标准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示,但这仅仅是形式而已,实质上是教育行政部门‘把持着评审的通过率,或者说教育行政权力在起着主导作用,因此,不可避免就会产生寻租和腐败。”

董教授说,现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课题基本上被有权、有名的人垄断了。特别是一些重大招标课题和省里的课题,有的是因人而设,有的是没有任何前期成果也没有科学论证,就能拿到课题。而职称评审和各种课题是互为因果的,评上职称就意味着有权力可以寻租,能寻租就能搞到课题,搞课题又是评职称的一个重要条件。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困难的还不是出成果,而是找不到关系。除非科研成果特别突出的那几个人。长期以来,这

种现象已经让人们感到司空见惯。”他说。

调查中63.3%的人表示,人们为职称耗尽心力,不利于出真正的成果。

“如果按照现在的体制,林巧稚都评不上教授职称,因为她也没发表几篇文章。可如果整天操心职称,她也做不成名医。”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说,大家都反感这种职称评定。“医生又要做临床又要做研究,怎么可能呢?现在全去做研究时间都不够,明显削弱了医生的功能。”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学术咨询中心主任甄源泰指出,职称评审原本是一项需要社会各界分工合作的管理工程,如今变成“一锅粥”。由政府主导评审,为体现“社会公平”,势必突破用人单位的界限,将鉴定工作标准作大范围的、甚至是跨行业的横向比较。这样一来,诸如学历、学位、外语水平、权威报纸杂志发表的论文等容易被统一标准的“硬指标”,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单位业绩、实际能力、工作态度等不好统一标准的“软指标”,自然挤不上职称评议的台面。

## 64.2%的人赞同“职称评定应该真正体现业务能力”

调查中,43.7%的人希望职称评审不要“一刀切”,应从各行业的专业特点改革职称评定体制;54.8%的人表示,职称评审不要行政化色彩太浓,不要和岗位、待遇等挂钩。

“大家都挤破头去评职称,说到底还是为了利益。评上才能聘上,工资才会跟着上。很多学科带头人等荣誉称号,职称都是基本条件。”刘飞说。

陕西一家民企人力资源部负责人陈博,最近报考了“中级人力资源管理师”,上培训班时他发现几位国企人事处老员工,都快退休了,还在拼职称,就是为了有更好的退休待遇。

中国人民大学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吴春波提出,从根本上解决职称问题,必须反思几个最基本的,也是常识性的问题:建立职称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什么?现行职称制度设计的根本缺陷是什么?他指出,问题不在于指标,指标只是评价工具。如果少了现在的这些指标,换一些“德能勤绩”,职称评定会更腐败。

究竟该以什么标准来评价人才?调查中,“业务能力和成果”成为首选指标,90.5%的人对此表示认同。41.8%的人认为是“理论水平”,选择“考试分数”的占27.9%,还有15.4%的人选择了“英语或计算机等技能”。

调查中,64.2%的人赞同职称评定应该真正体现业务能力;52.8%的人表示可以考虑引入市场化的评价体系。

甄源泰指出,职称问题不完全是评价标准的问题。一个负责任的、有经济实力的用人单位,必然会用客观标准来要求人才。而现在一些国企等用人单位,没有要用能人的压力,变成了想给谁就给谁,这跟市场基本规律不相符。

“为了职称评定,浪费了多少本应全心投入工作的精力啊?”刘飞说,现在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工资、住房等福利待遇完全同职称挂钩,跟工作效率、工作成绩毫无关系,这无疑会挫伤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职称,已成中国之‘累’。我希望取消职称评审制度,重新建立一套社会和业内认可的职称评价标准,真正使职称反映实际能力。”

甄源泰则表示,每个人都有社会身份,根据社会身份分配各种利益,职称是社会身份的主要标准。在这一点没有改变之前,职称就不可能取消。因为这是对整体社会体制的一种适应。单单废除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以局部改革来完善职称管理体制,完全行不通。

调查中,53.7%的人认为需重新建立一套社会和业内认可的职称评价标准;但也有45.2%的人表示,目前还找不到合适的职称评价标准取代职称。

## 核心提示

近年来,随着农村市场的快速发展,乡镇农技人员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进行了转变。然而,在转变过程中,乡镇农技推广体系出现了不同程度“线断、网断、人散”现象。新形势下,乡镇基层农技人员缘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 一名乡镇农技人员的情怀

秋风轻抚着大地,农田里一派忙碌景象。一位老者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在田埂上,不远处几只小麻雀绕着稻田飞来飞去,刚刚翻耕过的农田透着泥土的清新和芬芳。眼前这一切,对这位老者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他已经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干了30多年,几乎每块田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位老者是登封市宣化镇农技站站长景更新。

年近六旬的他看上去有些弱不禁风,提起自己的工作,景更新摇摇头显出了一脸无奈。他说:“我在农技这个岗位上工作已有30多年了,负责16个村委农技工作,每天不管刮风下雨都要下乡去考察,给农民讲授怎样种地、配肥、灌溉等知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跑几年,不知道还能给乡亲们服务几年。”



基层农技人员在田间开展调研活动(资料图片)

景更新告诉记者,从他接触这个工作以来,几乎没有在办公室长时间待过,更别说休息日了。因为乡亲们需要他。天待在办公室里,不去下乡考察永远发现不了问题,培训传授技术,为乡亲们做事,他特别乐为。

“农业发展、农民增收,靠的是政策,是科技,是人的努力,我们就是农业科技的传递者。专家不通过农技人员很难将技术推广给农民,农民不通过农技人员也很难找到专家,为了乡亲们的利益我累点儿无所谓。”景更新说。

景更新欣慰地说:“这么多年了我还真喜欢上了农技工作,如果有一天我跑不动了,还真有点感到孤单。”

景更新回忆说:“前年,有一个同事由于身体不好病情很重,无奈之下只好在家养病,但他心里很不踏实,放心不下乡亲们的农作物,拖着虚弱的身体下田指导农民。农技人员生不得病,农民太需要了。真不知道我哪天跑不动了,农民找谁给他们指导。”说到这里,景更新显出了一脸无奈。

## 乡镇农技人员现状

农技人员应带领农民群众走勤劳致富的道路,为农业增收、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可现如今农技人员的作用却差强人意。

登封市农业广播电视分校校长申俊华说:“乡镇农技人员流动性大,专业人员缺乏,自1993年后几乎来就聘的大学生都不是学农业专业的,这些不是学农业专业出身的农技人员对农业技术一点都不了解,没法和农民进行沟通,更别说传授经验、技术,乡镇非常缺乏专业农技人员。”

# 新闻时评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2 E-mail: zxyw@zzynews.com

## 时政点击

## 对摊贩开放街道的正面价值

街边摆个小摊,看起来很不起眼,但在现实语境中,却是一些人家糊口的生计所在。据媒体报道,10月19日下午,许昌市政府网发布了城管新举措,许昌市区即日起向摊贩开放23条街道,供小商小贩正言顺地摆摊设点。预计首批23条道路可容纳2359个摊位,全天开放,允许流动商户自由进入。其中,市区商户基础较好的文化路、兴华路在23个街道之列。途经该路段的105路公交车,也将改道。

一个城市开放街道摆摊,在全国尚不多见,人们在城市所见惯的是城管与小商小贩的对抗性博弈。制度设计的缺陷,是此种窘境的主因。城市管理者缺乏承担责任的能力,不能以诚意、诚心包容低层劳动者,是造成“鸡飞狗跳”、城管对小商小贩乱打乱撵的根源。

一个和谐、宜居的城市,少不了小商小贩这样的人群。提篮小卖,是一个城市不可或缺的生活元素,是一种基本的经济形态。城市能够容纳众多的“小商小贩”,是一个城市文明的表现。给小商小贩一个觅食的场所,就是给了他们一项衣食温饱的保障。一个城市中,哪类人群都有他们的生存权利。小商小贩自食其力,劳动是辛苦劳动,所得是合法所得,他们的存在证明着其他人群的宽容与善意,他们的生存尊严也关涉到一个城市的体面与否。一位行政法专家曾说,就公共行政上的学术理论来说,执法上也是要讲究“比例原则”的,对于社会的底层要多些宽容。摆小摊的、做小生意的多是社会上经济能力较差的,执法就要宽松一点儿。有些事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这好过让他们没有了谋生能力而要全靠政府救助。

许昌开放23条街道供摊贩摆摊,是一个城市公共行政管理改善的信号,所释放的是利于弱势群体利益的正面价值。如果操作得好,将是公众之福,一个城市之福。

## 闫德利 一个迷情年代的错乱符号

一个名叫“闫德利”的女子在博客上自爆身患艾滋,并公布接触过的数百名男子的手机号,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随后,被指认的闫德利现身称,她的名字被他人假冒,发生在她身上的事“都不是真的”。(10月18日《新京报》)

闹剧扑朔迷离,真相尚待澄清。但博客上的若干信息与被恶搞主角的人生路径倒是有几分吻合。“闫德利,河北容城,15岁外出打工,进京。”这些元素已构成一面镜子,隐约呈现出一个乡下进城女孩在这个时代中可能会因循的某种脉络。

博客自称是为了找到三个月前分手的情夫,现实却是“两年来跟一个北京人谈恋爱,已不再工作”,“这些很可能是其前男友所为”——此人有妻有子,闫德利与其分手,对方不满,“开车来闹事,甚至拿出一盘光碟要当众播放。”

## 当冷漠成为一种“病症”

本土一些人的冷漠“病症”,让外邦人士看不下去了。近日,一组来自中国的照片引起了日本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照片中,一条受伤的小狗躺在马路中央,它的同伴向过往的行人“求助”但无人理会,有行人甚至掏出手机拍照……许多日本人在看了照片后称中国人的袖手旁观反映出他们“没有爱心”。(10月16日《国际先驱导报》)

爱心是一种恩泽,于己而言,爱心本身能带来恩泽,它还是推及他人的恩泽。当冷漠成为一种“病症”,爱心便不再存在。在生活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感受过冷漠所散发的气味,但却有许多人自觉地销蚀着作为人的主体性,成为冷漠的载体。

应当说,本土的文化基因里就有冷漠的基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这种基因,少管闲事亦是冷漠的基因。冷漠,不是人天生所具有的。冷漠,像学会一样东西那样,是可以学会的。当慨叹好人难当,又不想再当好人的时候,冷漠就学

到手了。当有人对跌倒的老人不去搀扶,不去帮助,当人们在公交车上对艰难的孕妇视而不见,不给让座,冷漠就是学到了家了。当然,产生冷漠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时热心帮人,却帮出了负面价值,是挺让人心寒,但即使是这样,也不能成为人性冷漠的理由。

冷漠感和麻木感是一对兄弟。冷漠的人对人与事是麻木的,麻木的人往往也很冷漠。当冷漠和麻木成为人们身上的一个明显符号,不但会对一条受伤的小狗不加以理会,就是对需要救助的人亦会毫无反应。人心隔着肚皮,人心的冷漠就藏在一个人肚皮的里面,在遇到事儿的时候,这种冷漠才会显露无遗。“没有爱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指斥,而是存在着的显著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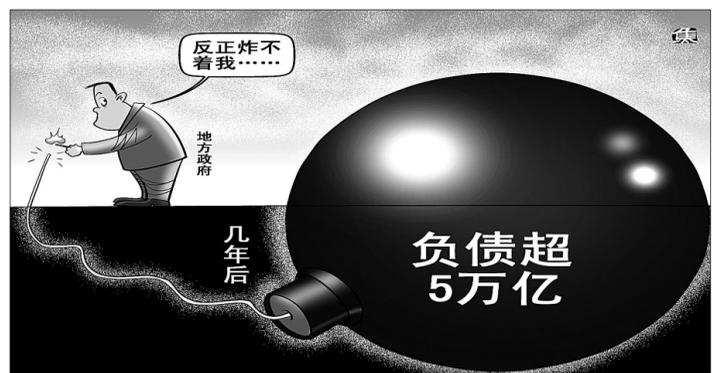
爱心是人的恒久忍耐,爱心是人的恩德,爱心是人不求自己的益处。没有爱心,人就失去了生活的依据。冷漠的社会是可怕的社会,道德麻木的社会是没有人尊严的社会。 伊文

始主动或被胁迫,由此引出爱恨情仇一串串。

“嫁给一个北京人,是女儿的理想。”能够拥有一把城里的月光,也不只是回家阿妹的追求。不愿奋斗,不愿化蛹成蝶,“当了女婿”换来的还算高尚,当了情夫或情妇换来的都不以为耻。

附在“闫德利”身上的剧情或许都是假的,但其隐喻的某类打工妹的错乱之路未必就不是真的,“闫德利”其实是一个迷情年代的错乱符号,浮现的也是某些男人的无耻以及社会一角飘出的叹息。

“闫德利”或是受害者,纯属虚构,但谁保不会有“王德利”、“李德利”正在经历着一场人生劫难。诚然,对“闫德利”可以不炒作,不关注,但这个博客出现的本身,不能不引人思考,那些没有方向的生活方式,或比“艾滋”病毒更让人可怕,需要阻截其蔓延传播。还“闫德利”清白容易,还原社会的纯净,消除“艾滋女”的土壤却并非易事。



国家发改委指出,地方政府负债超5万亿和城投债发行规模的空前上涨或引发信用风险和偿还风险。数据显示,城投债在今年前8个月发行量已占到过去4年发行总量的一半以上。地方官员为升迁搞政绩工程,造成地方政府寅吃卯粮,难道中国的地方政府没有像外国的地方政府那样有破产之虞吗? 焦海洋 文/图

## 日光浴晒的是什么

早就有“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在很多方面看来都是走在风气之先的,包括生活习性与相对宽容的心态。最新的例证如下:平日,有某外籍人士在上海某小区的草坪上晒了日光浴,旁边还有一位身穿比基尼的女士同晒。接到业主投诉后,保安与当地居委会轮番上阵劝说,终于把两位劝了回去。

有业主投诉与最终被劝回去了怎还能说是宽容?很简单,即使在劝说的时候,小区其他业主也未围观,而且在事后很多业主都表示可以接受。想当年群众的眼晴可是能够杀人的,而现在大家看过去会很正常,自然算是宽容得很了。至于说个别业主投诉以及保安、居委会出头,也是要宽容个人有其他的活法,都视而不见未免也就谈不上价值多元与宽容了。

这件事让人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倒还真不在于法律是否有所谓裸露程度的相关规定。您看,电视上一说选美必有的环节就是泳装展示,而且都是在公共电视台上,并无所谓分级的制度。既然在大众传播领域是可以的,在小区里上演一下“真人秀”似乎也并不算意外之举。

这事儿最好玩的地方应该是体现了某种隐喻。虽然现在居委会的职能与人员构成远非当年“小脚侦缉队”可比,但始终还是作为最基层的社会组织而存在着,并且在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其中的一个作用就是端正风气。

碰到这种场面,当然是居委会出马比较合适。鉴于其介于正规的执法机构与民间团体之间的地位,在事情上多少有些优先权。因为真要是有什么方面出面,必然就会谈到法律问题嘛。而居委会尚有道德监护的不成文责任,出面还是恰当的。

这也正好反映出一个现象:在很多情况下,代表表面上旧有的主流的道德意识其实已经边缘化,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与宽容的态度早就超前于它们。居委会走在前面的现实,就构成了我们生活中最寻常的某种冲突的样式,即在公共化的生活空间当中,还是由这些居委会与类似于居委会的机构管理,但实际上社会思潮与生活习惯、文化转换的暗流早就冲开了口子。

所以,那位外籍人士被记者问到“若再被阻止怎么办”时说:“就不理呗。”这也是很多时候,基层管理的写照。 五岳散人